

教育交流与合作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兼论中外合作办学的文化使命

陈兴德

摘要:教育交流既是促成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路径,也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作为当代教育交流的基本形式,中外合作办学负有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逐步缩小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差距的光荣使命。针对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本文以近代留学运动和教会大学等历史时期的中外合作办学为例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现代化

如同个人的存在必须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任何一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也只有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中才能实现。文化交流具有多种形式,教育交流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某种程度上,“一部世界教育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教育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1]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日益深入,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交流方兴未艾。中外合作办学正是这一潮流的具体表征。无论是“请进来”(在国内建立专门办学机构)还是“走出去”(项目合作),其要义是引进与吸收域外教育资源,加快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被寄予厚望,更承载着使命。

一、教育交流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路径

所谓高等教育近代化是指由传统的、封建的高

等教育向近代的、资产阶级式高等教育转化的过程。众所周知,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这不仅意味着近代高等教育首先出现于西方,而且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缺乏自然地过渡到近代高等教育的条件。近代中外教育交流中“东学西传”虽然不绝如缕,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本质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后者是中外教育交流的主流。进一步说,在“西学东渐”方面最有代表性者,我认为要数近代留学运动和教会大学。有趣的是,这两个方面正与当代中外合作办学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及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宣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也揭示了中外文化“势差”的存在。在此以后,以留美幼童及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为代表,一代代留学生冲破“夷夏大防”,怀抱“师夷长技”的理想负笈海外,形成蔚为壮观的留学热潮。关于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人们可

作者简介:陈兴德,四川富顺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发展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项目编号:09YJC880061)”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

以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透视其贡献,然而“从最广泛、最一般的意义上看,最受影响的仍然是教育领域”。^[2]以留美学生为例,根据不完全统计,归国担任大学校长的就有近100人,^[3]其中著名者包括梅贻琦(清华)、胡适(北大)、蒋梦麟(北大)、竺可桢(浙大)、萨本栋(厦大)、顾毓琇(中央政大)、廖世承(蓝田师院)、郭秉文(东大)、查良钊(河南大学)等。此外,在留美生中还产生了一大批在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如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叶企荪、任鸿隽、竺可桢、钱三强、侯德榜等。其次,留美学生积极引入美国大学模式,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办现代学科,完善大学教育。如1920年姜立夫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竺可桢在南京高师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系;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师创办我国第一个生物系;1926年,叶企荪、杨光弼、钱崇澍分别创办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1927年郑之蕃创办清华算学系;1928年,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29年,王守竞参预筹建浙大物理系;1932年,庄前鼎、顾毓琇分别创清华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再次,留美学生还引进西方教育科学理论,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留美学生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胡适等大力宣扬实用主义思想。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胡适、蒋梦麟等的教育功能论、教育独立论等理论逐步形成并影响中国教育。^[4]

以教会大学为代表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则可视为西方教育资源在中国的直接植入。自第一所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1879)建立至所有教会大学被收归国有(1952),70多年间,外国教会在中国陆续创办近20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最负盛名者包括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圣约翰大学、辅仁大学等。不可否认,教会大学一开始怀着强烈的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是随着教会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改组其内部组织并日益实现本土化后,教会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一部分。概述教会大学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一是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如老舍(燕京)、冰心(燕京)、许地山(燕京)、梁宗岱(岭南)、程千帆(金陵)、萧干(辅仁)等一批著

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史念海(辅仁)、吴于廑(东吴)、章开沅(金陵)、周一良、谭其骧、翁独健、石泉、白寿彝(燕京)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汝信(圣约翰)、方东美(金陵)、赵雅博(辅仁)、李镜池(燕京)、严群(燕京)等一批哲学和哲学史学家,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杨庆堃、张鸿钧(以上均出自燕大)等一批社会学家。^[5]二是引进了一批当时中国没有的现代学科,如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社会学,金陵大学的心理学、农林学等,不仅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系科,也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三是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如燕大与密苏里大学成立了“合作基金委员会”(1923),与普林斯顿大学缔结“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与哈佛共建“哈佛-燕京学社”(1925),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共同成立“东西文化学社”。这其中最有影响者当数“哈佛-燕京学社”,后者强调“用西方研究外国文明的仪器设备和技能,去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学习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的目的,通过师生互换、出版学术刊物、出版古籍和编纂工具书、添置图书、扩大双方图书馆等管道,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四是,教会大学不仅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而且最早在大学里实行男女同学。此外,教会大学构筑了全新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这反映在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同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系科,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近代化。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具有了培养人才、发展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促进了高等教育职能的近代化。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从而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标榜教育民主,倡导学术自由是教会大学的突出特征,也是其对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贡献。此外,教会大学注意培养学生严谨笃实的学习精神,严格考评制度,实行奖优汰劣,促进了学风建设的近代化。^[6]

从客观效果分析,无论是近代留学运动还是教会大学在“西学东渐”——即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精

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季羨林先生在评价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认为,“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7]他将留学生比作“盗取”文明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一比喻既形象生动,更直接揭示了近代留学运动的宗旨,那就是如容闳所说,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8]而从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来看,教会大学既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驱,培养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摇篮,现代文化在中国的重要集散地,同时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真正的“国粹”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培育中华民族的现代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民族振兴的伟业,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9]

二、教育交流是促进中国高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宣告了中外文化交流新阶段的到来。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费孝通先生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表述很有启发性。^[10]所谓“各美其美”就是各个国家、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具有不可替代性;所谓“美人之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互补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谓“美美与共”,就是通过文化的交流,缩小差距,消弭隔阂,增进共识。一定程度上,上述观点正可成为当代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指标。

联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状况,当代中外高等教育交流要完成怎样的任务呢?美国学者阿尔特巴赫认为,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相类似,存在一个知识生产与消费的“文化生产链条”——处于这个链条上端的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学,处于其末端的则是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前者在国际知识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后者则居于“边缘”地位。那些处于“中心”的欧美大学,“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在学术研究系统领域起着领导作用,是知识的创造者”;而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它们是知识的消费者,照搬大学的发展模式,很少产生出原创性的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的前沿”^[11];由此导致“边缘”

与“中心”的大学构成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阿尔特巴赫认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学都处于这种“边缘”地带,同时,他对这些国家的大学摆脱依附地位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不可否认,阿尔特巴赫的观点体现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教育问题的关切,但同时也流露出他作为一位美国学者常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一些具体的观点也有商榷之处。^[12]但是,上述观点部分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等、不均衡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现实关系。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决定了当代中外教育交流的主要任务,是不断缩短中国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担负着这一光荣的使命。然而当前中外办学的实践说明,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克服诸多的障碍。

一是逐利思想与办学过程的过度市场化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均将中外合作办学定位为“公益性事业”,但在现实中,不少高校将“营利性”和“产业性”视为中外办学的首要职能。面对着高于普通高校本科生数倍到十几倍的学费,有学者指出,“我们也应该反思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过度市场化趋势,重新审视教育援助与教育贸易这两种理念的关系,认真追问教育贸易这种以谋求利益为首要任务的合作办学理念,是否已经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是否已经偏离了我国引进外来教育资源的初衷,是否已经成为国家财富流失的秘密通道?”^[13]

二是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缺失,外国教育资源整体水平不高。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中虽然不乏诸如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举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德经济法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共建上海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复旦大学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举办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等“强强合作”行为,但一些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鱼龙混杂”、“乱象频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还缺乏真正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李盛兵等针对11省中外合作办学现状所做的调查显示，与中方高校合作数量最多的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其中澳大利亚参与高等教育层次项目共计137个，由该国综合排名前5名的高校举办的项目为5个，占全部项目的3.65%。美国、英国、加拿大3个国家参与机构和项目分别为82、93、81个，合作高校在这3个国家国内排名前20位的分别为2、1、5个，比例分别为2.44%、1.08%、6.1%。^[14]

三是入学资格宽泛，门坎过低。我国出国留学有三类：一是优秀学生，他们往往利用国外更有吸引力的教育条件和奖学金待遇申请到国外学习；二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他们往往因国内就学不理想而申请自费赴国外留学；第三类是在国内没有机会考上理想的大学且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这类学生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目前一些中外合作办学单位为了扩大招生规模，往往降低入学录取成绩，甚至不要国内高考成绩，就将学生招进学校。在无法授予国内文凭的情况下，就只授予外国教育机构的文凭。但这些国外院校文凭往往也存在能否得到国家承认的问题。^[15]如此“不择手段”地“收割”生源市场，不能不令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前景持谨慎的态度，正如学者所说，“当公众对中外合作办学失去了信任，等待中外合作办学的，将是荒凉的结局。”^[16]

三、鉴往知来，当代中外教育交流的应然取向

中外合作办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向和策略。为此，有学者提出各种建议，包括厘清“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健全审批和监管制度等。笔者认为，包括近代留学运动和教会大学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既是留学运动和教会大学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也给当代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借鉴。

(一) 厘订宗旨，志存高远

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留学生都是社会的精华。如果说近代留学生肩负着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责任，“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意味着留学超

越了个人利益诉求，背负家国的期望，这就是希望他们日后成为“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制造家与政治家，欲其归国后实施所学为宗国教育上、实业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建设改革，非徒欲其专一职司一业自给其身已也。”^[17]1914年，留美学生刘树杞就曾如是说：“吾人今日当实地求学，登峰造极，极各尽其能，他日归国，首当发达祖国之教育，以培植人才于内地，使祖国之学问，可以与欧美抗衡”。^[18]许先甲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呼吁：“吾即躬逢其时，目击其胜，其负笈数万里外，眼就求世界学术，行将深造有得。归去宗邦，出所学以利民济世，此非所谓千载一时而可以踌躇满志哉！”他号召留学生富有责任心，扎扎实实做学问，以求“他日者荡涤邪秽，剪除国耻，使灿烂庄严之中华民国实现于东隅”。^[19]这些滚烫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慨系之。由此观之，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还是相关学生，都需要重新反思合作办学的初衷，明确其宗旨，要从一个部门或个人的私利中有所超越，尤其是要防止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公益与文化责任的行为。

(二) 严格资格，完善考核

近代留学运动尤其是庚款留学之所以成绩斐然与学生的高质量有直接关系，后者得益于严格的考试选拔。如三次庚款留美甄试，第一次630名考生最终录取47人，第二次从400余名考生中录取70人，第三次考试最后录取63人。他们中，第一批中有王世杰、金涛、梅贻琦等人，第二批中有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人，第三批中有姜立夫、陆懋德、杨先弼等人，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专家。总之，“此次考试科目之多，水平之高，录取之难，在清代留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有效地扭转了长期以来留学生选派过程中的冒滥风气。”^[20]学者统计，抗战前和抗战中以庚款留美、留英考试竞争尤其激烈，最低录取率为4.7%，六届之平均录取率也不过7.3%。^[21]激烈的竞争考试，使一批素质高、学习基础好的留学生脱颖而出。在庚款留美、留英两大公费考试中，涌现出了不少家喻户晓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如“两弹一星”功勋学者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王大珩、彭恒武、屠守锷，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试管婴儿之父”张民觉,数学大师林家翘,著名学者钱钟书,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黄昆,历史学家何炳棣,国际法大师王铁崖、韩德培,力学家钱伟长,水利学家张光斗,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化学家卢嘉锡等。对照当前中外办学过程中招生门坎过低,标准过宽的现实,不能不说严格标准,宁缺毋滥应该成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招生的基本原则。从短时间来看,这样或许会导致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入学人数降低,经济收入减少,但是由于提高了学校的培养质量,树立了口碑,必将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三) 亲近名校,从业高师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按照名校先进的理念,聘请一流学者加入到中外合作办学中来,都不会显得过时。在此方面,近代留学运动和教会大学的实践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据统计,1911年650名留美学生中有418人分布在全美64所大学和专门学校学习,其中,康乃尔大学(50人)、哥伦比亚大学(37人)、伊利诺大学(37人)、威斯康星大学(29人)、哈佛大学(26人)、密西根大学(26人)、芝加哥大学(22人)、耶鲁大学(16人)等十余所著名大学成为留美学生集中的学校。^[22]又据梅贻琦、程其保统计,1854-1954年的百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有近2万名,而拥有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13所美国大学,其中有11所皆是20世纪20年代时位于美国前14名的大学。这些学校不仅设备优良、经费充足,而且名师荟萃。如居14所大学之首的哥伦比亚大学,其师范学院聚集了杜威、孟禄、桑代克、克伯屈等名震当世的教育、心理学家,其哲学系则有乌德瑞(Frederick Woodridge)、芒达基(W.P.Montague)等。留美学生出国前经过严格筛选,受过良好教育,出国后跻身名校,在名师指点下进一步深造,为他们回国服务于高等教育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是归国留美学生之所以能对中国近代高教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以教会大学为例,为了培养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教会大学无论是院系学科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都是直接从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

学等直接移植到中国来的”。^[23]譬如,被誉为“东方的哈佛”的圣约翰大学在1905年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条例组成完全大学,并陆续将美国大学的考试名誉制、选科制、学分制、导师制等引入到学校的管理中。此外,教会大学还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譬如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正是有这样一大批学者的到来,才使得教会大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无怪乎章开沅先生评价说,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与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24]

参考文献:

- [1]田正平,肖朗.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J].社会科学战线,2003(2):139-149.
- [2]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前言.
- [3]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2-155.
- [4]耿金龙.留美学生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7.
- [5][9][23]许苏明.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A].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8-52、41.
- [6]黄新宪.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4):121-127.
- [7]陈岱荪等.留学生是近代中国的报春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2):1.
- [8]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108.
- [10]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 [11](美)P.G.阿尔特巴赫.作为中心与边缘的大学[J].高

等教育研究,2001(4):21-27.

[12]陈兴德等.教育依附理论问题研究——以卡诺伊与阿尔特巴赫为中心[J].外国教育研究,2010(3):6-11.

[13]史秋衡等.过度市场化下中外合作办学的理念调整及发展规划[J].教育研究,2009(9):68-72.

[14]李盛兵等.中外合作办学30年——基于11省市中外合作办学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6-99.

[15]董洪亮等.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受青睐也乱象频现该如何选择?[N].人民日报,2009-07-10.

[16]熊丙奇.中外合作办学为何陷入声誉危机[N].半岛晨报,2010-08-30.

[17]胡明复.论近年派送留学政策[J].科学,1915(9):23.

[18]刘树杞.论中美两国之异同及中国留美学生之责任[J].留美学生季报,第一年春期,1914年3月.

[19]许先甲.敬告青年[J].留学学生年报,1913(2):1、13.

[20]刘海峰等.中国考试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68.

[21]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206.

[22]朱庭祺.美国留学界[J].留学学生年报,1911(1):12.

[24]章开沅等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序

(责任编辑 郑芳)

(上接第62页)

参考文献:

[1]杨德广.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9(5):37-40.

[2][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

[3]杨移贻.论高等教育核心质量[J].大学教育科学,2009(6):15-19.

[4]邹大光.中国高校贷款:问题与对策[EB/OL].<http://www.sinoss.net/2010/0129/18840.html>.2010-01-29.

[5]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1-43.

[6]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M].中华书局,1984:186.

[7]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21

[8]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

[9]李春萍.春风化雨: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2010(2):83-92.

[10]王洪才.论现代大学制度的结构特征[J].复旦教育论坛,2006(1):32-38.

[11]金维才.高校自主办学与大学章程的合法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254-256.

(责任编辑:郑芳)